

我的故乡西曲城村，是一个承载着悠久历史文明的村庄。

“曲城”之名，起源于西汉初年设置的“曲成侯国”（后为曲成县），这一建制一直延续到了唐朝初年。自曲城县撤废后，周边居民逐渐迁居至原“曲成”城郭遗址，由此形成曲城村，村落文脉也一直延续至今。

这片浸润着历史底蕴的土地，世世代代孕育着聪慧、勤劳、正直且尚礼的村民。

入党：从忧国青年到革命先锋

据1991年版《招远县志》记载，1938年8月中旬，中共招远县委在九曲村成立，核心任务是发展组织、建立武装、筹建革命根据地。西曲城村的第一名中共党员杨彩荣，便是在此背景下走上革命道路的。

1938年初冬，杨彩荣携妻子侯守月及女儿芝香到岳母家为岳父贺寿。宴席上，众人因日军侵华忧心忡忡，杨彩荣也提及了邻居外甥、教师王纯所述的时局：“日军占领东三省、进犯关内，国民党军队却节节撤退。”此时，岳母的外甥、共产党员白恩荣（山后冯家村小学教师）压低声音说：“朱（德）毛（泽东）领导的共产党正组织抗日，咱招远也有了县委，要发展党员、建立抗日武装！”

这番话让杨彩荣看到了希望。此后，他与白恩荣频繁密谈时局与抗战，逐渐坚定了革命信念。1939年2月1日，经白恩荣介绍，杨彩荣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西曲城村的首位共产党员。

建立组织：播撒革命火种

入党后，白恩荣作为杨彩荣的单线领导，指导他在农村秘密开展工作。杨彩荣始终将发展党的组织放在首位，在宣传革命思想、团结群众的基础上，筛选忠实可靠的发展对象。

1940年3月，他秘密发展贫苦农民刘全德（会治病、为人忠厚）、曹章（农闲时贩卖陶器、踏实可靠）为共产党员，成立了西曲城村首个党小组，杨彩荣任组长；

1941年至1945年，他陆续发展徐永辉（女，红军干部家属）、季云芳（女，曹章之妻）、冯立荣（女）、郭洪英（女）、张玉学（长工）等人为共产党员；

党员们也主动“扩编”。1944年，刘全德发展杨有臣为共产党员，曹章发展五弟曹奎为共产党员，党组织在村里逐步壮大。

地下工作：潜伏敌后的“伪乡长”

日军侵华战略调整后，对招远根据地展开大扫荡，还建立了区、乡、村等伪政权。中共招远组织顺势安排地下人员潜伏，杨彩荣便是其中关键一员——经灵山区第一任区长李萍安排，他以“曲城乡伪乡长”的身份，潜伏在朱桥镇日伪据点辖区。

为方便传递情报，杨彩荣搭建了严密的情报网，组成一条红色情报线：朱桥镇伪区长李曰乾（共产党员，杨彩荣族亲连襟）将日伪的动向情报告诉杨彩荣；杨彩荣假意修鞋，将情报转交给化装为修鞋匠、往返于朱桥与曲城的族侄杨之君；杨之君通过族叔杨彩藻的外甥曲绍昌（同乡盛家村人），将情报送给灵山区党组织。

1939年春，日军计划轰炸共产党组织临时驻地西曲城村“曹家大院”。杨彩荣通过情报网及时传递消息，使机关人员提前转移，仅院内房屋受损。此外，他还安排刘全德任西曲城村伪村长。每当日军进村时，村长刘全德便“摆桌备水”应对，减少了村民受欺压的次数。

凝聚力量：建武装、送人才

杨彩荣一边发展党员，一边落实“建立农村武装”的指示。

他动员族侄杨之君组建“锄奸团”，组织进步青年打击亲日分子、骚扰日军据点、破坏敌人工事与交通，让日伪军日夜不安。

1943年8月，在中共招北县委的指导下，他成立了西曲城村首个共产党领导的行政与群众组织。村长刘全德、副村长曹奎、会计杨金钟、农救会会长曹章、妇救会会长冯立荣、青救会会长曹文成、职工会长张普仁、民兵队长刘全喜为解放事业筑牢了基础。

同时，他积极为部队输送人才。1940年，他动员刘全本参军（西曲城村首位八路军战士），后刘全本在“六六灵山战斗”中牺牲，年仅16岁。同年，他安排杨之君加入第六区中队。1941年，杨之君升任招北县大队指导员，同年牺牲。1940至1944年，他先后动员杨安彩（14岁）、杨金盛等人参与区、县工作。1946年，他送16岁大女儿杨芝香加入招北县大队（解放后杨芝香任招远县民政、妇联干部）。1947年，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胶东地区时，他带头加入华东野战军，在平度三合山战役中负伤仍坚持战斗。孟良崮战役结束后，他转业到了羊角沟公安部门工作。

蒙冤与昭雪：高风亮节映初心

因地下工作保密需求，杨彩荣的“伪乡长”身份无法公开，亲友街坊多误解他“投靠日军”。1941年杨之君牺牲时，甚至有人怀疑是他“出卖”的。在重重误解下，他始终牢记周恩来总理对地下工作者的指示——“有苦不说，有气不叫；顾全大局，任劳任怨”，默默承受误解。

解放后，因“伪乡长”身份，杨彩荣从公安系统转业到潍坊地方工作，并重新申请入党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他再因“叛徒”嫌疑被审查，直至上级查明“杨之君牺牲是同事泄密所致”，才还他清白。

多年后，杨彩荣对儿子提及一段往事：1945年日军投降后，他在劝降朱桥的伪军时被误当成战俘押往栖霞。行至招远南部时，一位知情的押送领导当众“训话”后放他回家。这成了他心中永远的温暖记忆。

1981年，杨彩荣走完了一生。当时的蚕庄镇党委书记在追悼会上为他送别并致悼词。

高风亮节干革命，任劳任怨顾大局；舍身不求功名利，含辛茹苦为人民。杨彩荣一生的传奇岁月，恰如诗句所赞。他以平凡之躯，在敌后战场上书写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，也为西曲城村的革命历史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在他的言传身教下，他的6个儿女杨芝香、杨芝成、杨芝英、杨芝刚、杨芝言、杨芝欣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在岗位上勤恳工作。



杨彩荣

杨彩荣的女儿杨芝香

辕固以“汤武革命”之辩显儒术风骨，以《齐诗》传授立经学根基，其行迹载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是西汉儒学转型期的关键人物。厘清其籍贯，不仅是解决个体历史公案的问题，更是还原齐鲁早期儒学地理分布的重要一环。而栖霞，正是这一历史定位的核心指向。

生平轨迹与齐地渊源

辕固的学术实践与故里伏笔

辕固（约公元前234年—公元前104年），又称“辕固生”（“生”为尊称）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《汉书·儒林传》称辕固“齐人也”，其实为西汉睡县（今栖霞）人。其一生与西汉儒学从“黄老附庸”到“独尊儒术”的转型深度绑定。汉初黄老思想主导朝堂，至景帝时，儒家始获话语权，武帝时确立正统地位，辕固的治学与入仕经历，恰是这一过程的缩影。

（一）学术奠基：齐诗学派的地域根基

辕固专攻《诗经》，景帝时授博士，创立“齐诗学”，与鲁诗、韩诗并称西汉“三家诗”。其学说深植齐地文化基因：一方面提出“以三百五篇当课书”，将经典阐释与政治实践结合，契合齐地“经世致用”的学术传统；另一方面融合阴阳五行思想，开创“四始五际”之说，与齐地方术文化一脉相承（汉·班固撰《汉书》卷八十八《儒林传》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第3608页）。该学派由弟子夏侯始昌（东莱人）、后仓传承，至匡衡、萧望之达于鼎盛——夏侯始昌的“东莱籍贯”并非偶然，暗示辕固的学术活动与胶东地区（含栖霞）存在紧密的地域关联，为其故里在栖霞埋下学缘伏笔。

（二）政治实践：齐人身份的隐性印证

辕固的政治生涯两次凸显“齐人”特质：其一，景帝时与黄生辩论“汤武革命”，以“民贵君轻”立论，呼应齐地孟子学派的民本思想；其二，触怒好黄老的窦太后，被关进猪圈与猪搏斗，却得景帝暗助脱险，背后是景帝借齐地儒学制衡旧贵族势力的政治考量。武帝即位后，90岁高龄的辕固以贤良应征，却告诫公孙弘“务正学以言，无曲学以阿世”（《史记》卷一百二十一《儒林列传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3122页），最终罢归故里专事授徒。此处“故里”虽未明指，但结合后世文献对其墓葬的记载，恰与栖霞（睡县）形成时空呼应。

（三）历史影响：风骨象征的地域归属

辕固的“革命论”为后世王安石、黄宗羲等改革家提供了思想资源，其“学术独立”精神成为中国士人“道高于势”的象征。而这一精神的地域根源，正需通过其故里——睡县（栖霞）的历史地理语境来解读。汉代睡县初属齐郡（《史记》成书时的行政区划），汉武帝后划归东莱郡（《汉书》记载行政区划），这种差异导致后世对辕固籍贯的表达存在分歧——《史记》称“齐人”是因早期归属，《汉书》亦称“齐人”，后世经地名沿革考据推定其为东莱郡睡县人。

正因为辕固具有深远的文化影响与独特的名人效应，后世围绕辕固故里归属的争议始终存在——既有观点认为其故里在栖霞（睡县），也有说法指向桓台。而要厘清这一争议的核心事实，需依托“连续性、权威性”的文献传承来展开实证考证。

文献链实证

从唐至现代的栖霞籍贯记载谱系

判定古人籍贯，最核心的依据是“连续性、权威性”的文献传承。针对辕固的籍贯，自唐代起，国家级地理总志、省级通志、地方史乘及现代工具书形成了无断裂的证据链，均指向栖霞（睡县）。

（一）唐代奠基：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的墓葬定位

唐代李吉甫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（中国现存最早地理总志），首次将辕固与胶东地域直接关联起来。其卷十一《河南道七·登州·蓬莱县》载：“汉辕固，齐人，墓在县东北二十里。”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一，中华书局2008年点校本，第398页）。岱南阁丛书本（孙星衍校）亦将此内容载于“蓬莱县”条目下，符合唐代的政区划分——在唐代，今栖霞境属登州蓬莱县阳瞳镇，尚未设县。李吉甫任唐代宰相后，主持编纂时参考秘阁档案，其记载应基于唐代尚存的更早文献。

清代《四库全书》中的《元和郡县志》（因原佚失删“图”字）卷十一《河南道七·登州·栖霞县》，将“蓬莱县”改为“栖霞县”，载“汉辕固，齐人，墓在县东北二十里”（唐·李吉甫撰，《元和郡县图志》[《四库全书》因图佚，题作《元和郡县志》]卷十一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468册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，第256页）。清代《四库全书》将“蓬莱县”改为“栖霞县”，此为后世以金代行政区标注唐代地理，非李吉甫原文，属历史地理文献的常规整理方法（清·卢文弨《补元和郡县志序》载：“其散佚者，可由《太平御览》《玉海》辑补，地名沿革则以今溯古。”《抱经堂文集》卷四，中华书局1990年版，第57页）。

墓葬是籍贯的核心实物证据。在汉代“归葬故里”的传统下，辕固墓在蓬莱县（今栖霞）的记载，直接指向其故里为栖霞。

（二）宋元承续：《太平寰宇记》的位置确证

北宋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进一步锁定了辕固墓的具体方位，日本藏宋刻本（元丰八年福州东禅等院刻）卷二十《登州·蓬莱县》载：“汉辕固墓在蓬莱县东北二十里。”（《太平寰宇记》宋刻本，日本蓬山官库藏）

后世整理本改“蓬莱县”为“栖霞县”，此为用金代以后的政区名回溯标注宋代地域。如《太平寰宇记》四库本卷二十《登州·栖霞县》载：“汉辕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。”（乐史撰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461册，第527页）然而，此书成书远早于栖霞置县，此条明显系清代编纂者用后世地名回溯标注。中华书局2007年点校本（以光绪金陵书局本为底本）卷二十《河南道二十·登州·栖霞县》条目下亦沿此记载：“汉辕固，齐人，治《诗》为博士，景帝时与黄生争论汤武革命，后归老于乡。墓在县东北二十里，今存。”（第398页）

结合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《登州·黄县》载“睡县，汉源县，省并牟平……东莱睡县有之罘山祠”（中华书局2007年点校本，第377页），以及汉代睡县辖今栖霞、福山一带的史实，可证实辕固“归老于乡”即睡县（今栖霞）。

元代王钦所纂《齐乘》作为现存最早的山东通志，其不同版本对“辕固墓”均有记载。虽存在细微差异，却恰恰反映了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的演变：

元至正刻本（1351年刊刻）作为最接近作者王钦原笔的初刻，《齐乘》卷五《丘垄》明确记载“汉辕固墓在蓬莱县东北二十里”。此记载符合唐代政区（今栖霞）属唐蓬莱县。明嘉靖刻本（1564年杜思重刻）作为现存的可靠善本，忠实地保留了这一元代原貌。至清代，《四库全书》与乾隆胡德琳刻本（1781年）为适应后世地名，均将“蓬莱县”改为金代始置的“栖霞县”，作“汉辕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”，属“以今标古”的整理手法。现代权威的《齐乘校释》（刘敦煌点校，中华书局2012年版）则通过严谨考勘，纠正了清代的改动，恢复了“汉辕固墓在蓬莱县东北二十里”的记载，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最佳依据。

（三）清代定论：《山东通志》的籍贯明载

清代考据学鼎盛。沈钦韩在《汉书疏证》卷八十八《儒林传·辕固生》条目下，针对《汉书》“辕固，齐人也”的记载，通过地名沿革考证指出：“齐有睡县，属东莱郡，今山东登州府栖霞县。”（清·光绪二十六年浙江官书局刻本《汉书疏证》卷八十八）《山东通志》也以多重证据确立辕固“睡县（栖霞）人”的身份：

1. 籍贯明载：乾隆《山东通志》卷二十八《人物志·儒林》载：辕固，字子春，睡县人，以贤良征为博士。景帝时，与黄生争论汤武革命，以直谏忤窦太后，几死。武帝即位，复以贤良征，年九十余，对策称旨，拜清河太傅。今栖霞地也。（《四库全书》本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，总第471册，第623页）

2. 墓葬佐证：宣统《山东通志》卷三十四《陵墓志》载：“辕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。《太平寰宇记》云：‘墓在县东北二十里，今存。’元于钦《齐乘》亦载，今遗址犹存。”（1909年局刻本第23页）民国七年铅印本载：“汉辕固墓在栖霞县东北二十里。《太平寰宇记》云：‘辕固，睡县人。’元于钦《齐乘》亦载。按：栖霞县汉代属东莱郡睡县，辕固为齐人，而墓在此，盖晚年退居之地。”（民国七年铅印本，第12页）

清代考据学鼎盛。沈钦韩在《汉书疏证》卷二十八《人物志·儒林》载：辕固，字子春，睡县人，以贤良征为博士。景帝时，与黄生争论汤武革命，以直谏忤窦太后，几死。武帝即位，复以贤良征，年九十余，对策称旨，拜清河太傅。今栖霞地也。（《四库全书》本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，总第471册，第623页）

3. 新修方志收录：1990年《桓台县志》称“辕固，西安县（今桓台人）”，但未提供早期文献依据。（《桓台县志》编纂委员会编，齐鲁书社1990年版，第789页）

心区（临淄），桓台地近临淄，故属“齐人”范畴。

2. 地方纪念物与传说：称桓台县田庄镇有“辕固故里”遗址，附会民间“辕固故里”传说。

3. 新修方志收录：1990年《桓台县志》称“辕固，西安县（今桓台人）”，但未提供早期文献依据。（《桓台县志》编纂委员会编，齐鲁书社1990年版，第789页）

（二）“桓台说”的逐条实证辨析

1.“齐人”解读的逻辑谬误

《史记》的籍贯记载载体例很严谨，韩兆琦在《史记讲座》中系统论证了司马迁的籍贯记载载体例：“司马迁对籍贯标注在‘核心区详注县名，边缘区泛称齐人’的体例。若人物属齐郡核心区（如临淄周边），必标注具体县名（如伏生‘济南人’）；仅称‘齐人’者，多为边缘区或文化属齐的地域（如胶东）。”（《史记讲座》2008年版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第152页）如淳于髡称“齐人”，实则是齐郡淳于县（今山东安丘）人。胶东（边缘区）人辕固仅称“齐人”，合其体例。桓台汉代为西安县，属齐郡核心区，若辕固为西安县人，《史记》应载“西安人”而非泛称“齐人”。

更关键的是，唐代至清代的所有权威地理文献，均未提及桓台与辕固的关联——若辕固故里在桓台，为何千年间无任何国家级、省级文献记载？此逻辑矛盾无法自治。

2. 文献证据的绝对断层

唐代、宋代无任何史料记录。元代《齐乘》、明代《山东通志》、清代《宣统山东通志》等省级通志，均未记载桓台有辕固墓或故里。民国及此前的《桓台县志》，只有清代《新城县志》有记载：汉辕固，景帝时人，县治东北二十里辕固庄。庄南有辕固冢，冢上有祠。或以此为授经台。据考，为汉时村庄，村以人名，曾讹为牛固庄。原辕固庄门匾额：辕公故里。（《崔氏世谱》载：余族自大明洪武二年，由北直隶枣强县迁居山东济南府忻城县东北乡辕固里